

# 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建设:中国的实践

## ——从城市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

吴煜

(复旦大学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上海 200433; 上海大学 上海美术学院建筑系,上海 200444)

---

**摘要:**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劳动力转移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城市化所引起的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40年的城市化实践证明,对于人口众多且市场远未完善的转型国家,中国的城市化在显著地受到国家经济环境变化影响的同时,日益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 城市化; 经济增长; 劳动力转移; 劳动力集聚

**中图分类号:** F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8)01-0028-08

---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通过城市化建设,逐步将国家内部的人口、产业、资本等各种资源,以城市这一特定空间进行全方位的配置和调整。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劳动力转移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用近40年中国城市化的实践来进行验证。作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通过作用于各类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再配置,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

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过程。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sup>①</sup>由17.9%提高到56.1%,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同期,城镇人口规模由1.7亿快速上升到7.7亿,实现了年均超1600万人的由农民向市民、由农业向非农业就业的大转移。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特征事实。

#### (一) 城市化持续快速演进

伴随着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Market-Oriented Reform)以及城市人口的恢复补偿性增长,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从1978年到2015年<sup>②</sup>,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1949至1978年的4.1倍;城镇人口从17245万人增加到77116万人,增长了3.5倍,近6亿人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总数由193个猛增到656个,新增城市463个,相当于前30年(1949—1978年)增加量的7.6倍。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提高到了2014年的超过世界水平<sup>③</sup>0.77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仅用22年时间就实现了城市化率从

---

收稿日期:2017-11-15;修回日期:2018-01-04

作者简介:吴煜(1976—),男,江苏苏州人,上海大学建筑系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

①文中指的城市化率是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城市化率=常住人口/总人口。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年度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③数据来源: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4 revision( highlights),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1。

20%到40%的快速提升<sup>[1]</sup>,而1978年以来的年均城市化增长速度则是美国高速城市化阶段<sup>[2]</sup>(1986—1920年)的2倍。

## (二) 城市化水平在1996年之后大幅度提升

199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制度,加强了土地二级市场管理<sup>①</sup>。土地要素从无偿到有价,开启了高价城市化的进程<sup>[3]</sup>。从1996年开始,中国城镇人口一路攀升,连续8年每年新增人口2100万以上,虽然在2004年、2005年有所减缓,但在2007年和2010年再创新高,年新增人口达到了破纪录的2345万人和2466万人;城市化率也从1995年前(1988—1995年)的年均增长0.42%猛增到1.47%(1996—2003年)。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虽然,年度城镇人口和城市化率的增长在2010年后开始减慢,但也都维持在1800万人和1%以上的增长速度。

## (三) 城市规模空前增长

2000—2015年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由262个增长到295个,年均增长0.79个百分点。其中,100万人口以上、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sup>②</sup>分别由90个增加到147个、20个增加到53个,200—400万人口的城市增长了2.17倍。到2015年,中国共有城市656个,创造了全国80%的经济总量<sup>[4]</sup>;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5.21万平方公里,是2000年的2.13倍,大大高于同期城镇人口59%的增幅<sup>[5]</sup>。

## 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构建两部门模型

由于城市化研究的范畴基本是“现象的”,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sup>[6]</sup>。所以与研究范畴相应,主流文献并不十分关注城市化的效应,即对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上,探究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以及由于调整所带来的一系列改变。这种长期的调整过程并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我们关注的是,在转型的背景下,一些外部的力量可能成为新抓手,通过在空间上实现多个生产要素的转移和集聚来产生系统性合力,推动经济增长。对现在的中国而言,城市化就扮演了这种角色。本文试图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劳动力转移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sup>③</sup>,分析城市化中最基本的衡量因素——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一) 本文模型的基本假设

1. 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农业部门在农村,非农部门在城市,非农部门包括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进入工业或服务部门,就是从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完成了城市化。

2. 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  $Y_1(t) = K_1(t)^\alpha [A_1(t) L_1(t)]^{(1-\alpha)}$  (1)

其中:  $Y_1(t)$  是农业部门的产出,影响农业部门产出的是投入农业部门的资本  $K_1(t)$ 、农业部门的技术条件  $A_1(t)$  和投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L_1(t)$ ,  $0 < \alpha < 1$ 。

$K_1(t) = k [R_t, \lambda_t k_t]$  (2)

具体来看,投入农业部门的资本包括农业用地( $R_t$ )及除土地之外的其他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 $\lambda_t k_t$ ),  $\lambda_t$  是投入农业的资本比例。对于农业用地而言,尽管随着科技发展,一些原本不可利用的土地可以转化为农业用地,但是总体上,农业用地的增长速度是不断降低的,所以  $g_{R_t} = \dot{R}_t / R_t < 0$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的作用远大于其他形式的资本,所以  $g_{k_1}(t) \approx g_k(R_t)$ 。 (3)

①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决定》,明确“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有限期出让制度,对商业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要改变协议批租方式,实行招标、拍卖。同时加强土地二级市场的管理,建立正常的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

②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年末总人口为100—200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年末总人口为200—400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年末总人口为4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200万以上的城市=年末总人口为200—400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年末总人口为4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地区数据,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

③本文借鉴了陈宗胜(2004)、郭涛等(2006)模型的思想,重点从资本的具体表现、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和细化,同时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进行了分析。

$$L_1(t) = (1 - \omega_t) L(t) \quad (4)$$

假设, 全部人口都是劳动力, 劳动力的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  $g_L(t) = \dot{L}(t) / L(t) = n$ 。 (5)

$\omega_t$  表示全体劳动力中从事非农部门就业的比例。根据哈罗德-托达罗 (Harris-Todaro) 模型<sup>①</sup>,  $\omega_t = \omega(\rho \bar{\omega} + (1 - \rho) \omega_t, \omega_A)$  (6)

$\rho$  是指进入城市正式部门的概率  $\bar{\omega}$  是指城市正式部门的工资  $\omega_t$  是指城市非正式部门的工资,  $\omega_A$  是指农村工资。

劳动力转移受到工资的影响, 有两种情况: 当  $\rho \bar{\omega} + (1 - \rho) \omega_t > \omega_A$  城市工资 > 农村工资 劳动力会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  $\dot{\omega}_t > 0$ ; 当  $\rho \bar{\omega} + (1 - \rho) \omega_t < \omega_A$  城市工资 < 农村工资 劳动力会向农业部门转移  $\dot{\omega}_t < 0$ 。

农业技术进步是与投入到农业部门的实物资本或现金资本有关, 因此是资本的函数。资本通过影响农业技术进步来影响农业产出。

$$A_1(t) = B[\lambda_t K(t)]^\theta \quad (B > 0, 0 < \lambda_t < 1, 0 < \theta < 1) \quad (7)$$

$$3. \text{ 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是: } Y_2(t) = K_2(t)^\beta [A_2(t) L_2(t)]^{(1-\beta)} \quad (8)$$

其中:  $Y_2(t)$  是非农部门的产出, 影响非农部门产出的是投入非农部门的资本  $K_2(t)$ 、农业部门的技术条件  $A_2(t)$  和投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L_2(t)$ ,  $0 < \beta < 1$ 。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小于非农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1 - \alpha) < (1 - \beta)$ 。

$$K_2(t) = k[R - R_t, (1 - \lambda_t) k_t] \quad (9)$$

投入非农部门的资本主要是工业用地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假设所有土地全部用来进行生产, 一部分是农业用地, 其余是非农用地。即  $\dot{R}/R = 0$ 。在非农产业生产中, 非土地资本的作用更大、更明显。因此  $g_{k_2}(t) \approx g_k((1 - \lambda_t) k_t)$ 。 (10)

$$L_2(t) = \omega_t L(t) \quad (11)$$

$$A_2(t) = C[(1 - \lambda_t) K(t)]^\phi \quad (C > 0, 0 < \lambda_t < 1, 0 < \phi < 1) \quad (12)$$

## (二) 两部门的经济增长

### 1. 农业部门

将方程(2)、(4)、(7)代入(1)后

$$Y_1(t) = K_1(t)^\alpha [B\lambda_t^\theta K_t^\theta (1 - \omega_t) L(t)]^{(1-\alpha)} \quad (13)$$

对方程(13)取对数后求关于时间的微分, 并将方程(3)、(5)代入, 得到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

$$g_1(t) = \alpha g_{R_t} + (1 - \alpha) \theta g_{\lambda_t} + (1 - \alpha) \theta g_{k_t} - \frac{(1 - \alpha) \omega_t}{(1 - \omega_t)} g_{\omega_t} + (1 - \alpha) n \quad (14)$$

农业部门产出的增长与土地面积的增长、投入到农业部门资本比例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是正相关的; 与投入非农部门劳动力的比例负相关。在土地有限、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 要确保农业部门的增长, 必须加快资本投入。

### 2. 非农部门

将方程(9)、(11)、(12)代入(8)后

$$Y_2(t) = [(1 - \lambda_t) k_t]^\beta [C(1 - \lambda_t)^\phi K_t^\phi \omega_t L(t)]^{(1-\beta)} \quad (15)$$

对方程(15)取对数后求关于时间的微分, 并将方程(10)、(5)代入, 得到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

$$g_2(t) = -\frac{[\beta + (1 - \beta) \phi] \lambda_t}{1 - \lambda_t} g_{\lambda_t} + [\beta + (1 - \beta) \phi] g_{k_t} + (1 - \beta) g_{\omega_t} + (1 - \beta) n \quad (16)$$

<sup>①</sup>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想法是: 城市正式部门向工人支付高工资, 与正式部门支付的高工资相比, 城市非正式部门和农村部门工资比较低, 并随供给与需求的波动而波动。在这个模型中, 人口流动被视为人们对城市正式部门与农业部门显著工资差距的反应。当然, 在正式部门高工资的情况下,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进入这个部门, 有些人运气不好, 找不到正式部门的工作, 这时他们会转向城市非正式部门去维持基本的生存水平。因此, 移民的决定有点像离开一个相对比较确定的工作(作为农业工人或在家庭农场就业)而去面对寻找一个正式部门工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非农部门产出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劳动力的增长、投入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比例是正相关的;与投资农业部门资本的比例增长负相关。因此,在加大对农业资本投入的同时,只有加大整体的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才能推进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进程。

### 3. 两部门

$$\text{两部门的总产出: } Y(t) = Y_1(t) + Y_2(t) \quad (17)$$

$$\text{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的产出比例: } \gamma(t) = \frac{Y_2(t)}{Y_1(t)}$$

两部门产出增长率:

$$g(t) = \frac{\dot{Y}_1(t) + \dot{Y}_2(t)}{Y_1(t) + Y_2(t)} = \frac{g_{1t} + \gamma_t g_{2t}}{1 + \gamma_t} \quad (18)$$

将方程(14)、(16)代入(18),得到总产出的增长率为:

$$g_t = \left[ \frac{(1-\alpha)\theta}{1+\gamma_t} - \frac{\gamma_t \lambda_t [\beta + (1-\beta)\phi]}{(1+\gamma_t)(1-\lambda_t)} \right] g_{\lambda t} + \frac{(1-\alpha)\theta + \gamma_t [\beta + (1-\beta)\phi]}{1+\gamma_t} g_{kt} + \left[ \frac{\gamma_t(1-\beta)}{(1+\gamma_t)} - \frac{(1-\alpha)\omega_t}{(1+\gamma_t)(1-\omega_t)} \right] g_{\omega t} + \frac{\alpha}{1+\gamma_t} g_{Rt} + \left[ \frac{1-\alpha}{1+\gamma_t} + \frac{\gamma_t(1-\beta)}{1+\gamma_t} \right] n \quad (19)$$

两部门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增长、人口增长呈正相关,与非农部门就业比例、农业部门资本投入比例等因素密切相关。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受到  $\left[ \frac{\gamma_t(1-\beta)}{1+\gamma_t} - \frac{(1-\alpha)\omega_t}{(1+\gamma_t)(1-\omega_t)} \right]$  和  $g_{\omega t}$  的共同作用。

### 三、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验证诺瑟姆城市化三阶段<sup>①</sup>

(一) 当  $\left[ \frac{\gamma_t(1-\beta)}{1+\gamma_t} - \frac{(1-\alpha)\omega_t}{(1+\gamma_t)(1-\omega_t)} \right] > 0$ ,  $g_{\omega t} < 0$ , 劳动力向农业部门集中,对经济增长不利

由  $\left[ \frac{\gamma_t(1-\beta)}{1+\gamma_t} - \frac{(1-\alpha)\omega_t}{(1+\gamma_t)(1-\omega_t)} \right] > 0$ , 可以得出  $\frac{Y_2(t)}{Y_1(t)} \cdot \frac{(1-\beta)}{(1-\alpha)} > \frac{\omega_t}{(1-\omega_t)}$ , 即  $\frac{Y_2(t)}{Y_1(t)} > \frac{\omega_t}{(1-\omega_t)}$ , 非农产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大于非农产业劳动力比例与农业劳动力比例的比重,即产业的非农化程度大于城市化程度。

由  $\omega_t = \omega(p\bar{\omega} + (1-p)\omega_1, \omega_A)$ , 可知,当  $p\bar{\omega} + (1-p)\omega_1 < \omega_A$  时,城市工资小于农村工资,劳动力从非农业部门向农业部门转移  $g_{\omega t} < 0$ 。

因此,在总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非农部门有能力但没有条件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此时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且不向非农部门转移,这对经济增长不利。这与现实社会中诺瑟姆城市化三阶段的第一阶段相接近,即城市化水平较低,一般在30%以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提供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不利于经济增长。

(二) 当  $\left[ \frac{\gamma_t(1-\beta)}{1+\gamma_t} - \frac{(1-\alpha)\omega_t}{(1+\gamma_t)(1-\omega_t)} \right] > 0$ ,  $g_{\omega t} > 0$ , 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有利

由  $\left[ \frac{\gamma_t(1-\beta)}{1+\gamma_t} - \frac{(1-\alpha)\omega_t}{(1+\gamma_t)(1-\omega_t)} \right] > 0$ , 可以得出  $\frac{Y_2(t)}{Y_1(t)} > \frac{\omega_t}{(1-\omega_t)}$ , 非农产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大于非农产业劳动力比例与农业劳动力比例的比重,产业的非农化程度大于城市化程度。

由  $\omega_t = \omega(p\bar{\omega} + (1-p)\omega_1, \omega_A)$ , 可知,当  $p\bar{\omega} + (1-p)\omega_1 > \omega_A$  时,城市工资大于农村工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  $g_{\omega t} > 0$ 。

因此,在总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非农部门有能力且有条件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对经济增长有利,这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对应诺瑟姆城市

<sup>①</sup>从已经完成城市化过程的发达国家来看,城市化大体上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化三阶段的第二阶段,即城市化水平达到 30%—70% 之间时,城市工业基础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大批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可在较短时间内突破 50%,进而上升到 70%。

(三) 当  $\left[ \frac{\gamma_i(1-\beta)}{1+\gamma_i} - \frac{(1-\alpha)\omega_i}{(1+\gamma_i)(1+\omega_i)} \right] < 0, g_{\omega_i} > 0$ , 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不利

由  $\left[ \frac{\gamma_i(1-\beta)}{1+\gamma_i} - \frac{(1-\alpha)\omega_i}{(1+\gamma_i)(1-\omega_i)} \right] < 0$ , 可以得出  $\frac{Y_2(t)}{Y_1(t)} < \frac{\omega_i}{(1-\omega_i)}$ , 非农产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小于非农产业劳动力比例与农业劳动力比例的比重时,非农化程度小于城市化程度。

由  $\omega_i = \omega(p\bar{\omega} + (1-p)\omega_i, \omega_A)$ , 可知,当  $p\bar{\omega} + (1-p)\omega_i > \omega_A$  时,城市工资大于农村工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  $g_{\omega_i} > 0$ 。

因此,在总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非农部门有条件但没能力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虽然仍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对应诺瑟姆城市化三阶段的第三阶段的前期,由于工资差的存在,农村人口仍在向城市转移,但这种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超出了城市的承载能力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对经济增长不利。

(四) 当  $\left[ \frac{\gamma_i(1-\beta)}{1+\gamma_i} - \frac{(1-\alpha)\omega_i}{(1+\gamma_i)(1-\omega_i)} \right] < 0, g_{\omega_i} < 0$ , 劳动力向农业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有利

由  $\left[ \frac{\gamma_i(1-\beta)}{1+\gamma_i} - \frac{(1-\alpha)\omega_i}{(1+\gamma_i)(1-\omega_i)} \right] < 0$ , 可以得出  $\frac{Y_2(t)}{Y_1(t)} < \frac{\omega_i}{(1-\omega_i)}$ , 非农产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小于非农产业劳动力比例与农业劳动力比例比重时,非农化程度小于城市化程度。

由  $\omega_i = \omega(p\bar{\omega} + (1-p)\omega_i, \omega_A)$ , 可知,当  $p\bar{\omega} + (1-p)\omega_i < \omega_A$  时,城市工资小于农村工资  $g_{\omega_i} < 0$ 。

因此,在总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农业部门有条件且有能力时,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向农业部门转移,对经济增长有利。对应诺瑟姆城市化三阶段的第三阶段的后期,即城市化水平超过 70% 后,农业现代化基本完成,城镇人口的增加渐趋缓慢甚至停滞,城市化不再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而是可能出现城镇人口向农村的少量转移。

#### 四、中国城市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

城市化的基础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中国目前正处于诺瑟姆城市化的第二阶段,而且伴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和集聚,其他生产要素也会随之转移和集聚。中国的城市化从人口转移开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城市化释放消费潜力

经济活动和人口在城市的集聚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回报,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013—2015 年<sup>①</su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9.53%,超过了同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 1992 元,年均增长幅度超过了城镇居民。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 3.4 个百分点。更进一步,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源源不断的新增人口由于收入的增加,消费潜力不断释放。除个别年份外,1996 年—2015 年,中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稳定在 2000 万左右。到 2015 年,农民工总数超过 2.77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 亿人。到 2020 年,城镇人口预计将达到 8.5 亿人,农业转移人口近 3 亿人,加上其他常住人口,户籍不在常住地的人口近 4 亿人<sup>[7]</sup>。照此推算,随着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如果农民工的消费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2015 年),预计未来 10 年可增加的消费规模超过 4 万

<sup>①</sup>从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与之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

亿元<sup>①</sup>。

## (二) 城市化拉动有效投资

1978年以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0%以上,并在2003年后上升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2010年以后稳定在40%以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必然会使得城市的公用设施、城市维护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1981—201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0.74万平方公里增长到5.21万平方公里,34年增长了6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总和从52.1亿元猛增到28642亿元<sup>②</sup>,增长了549倍,累计投资达到26.1万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36%。按照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0%的目标测算,仅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总量就达到40多万亿元<sup>③</sup>。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质量提升,特别是城市群协同发展,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投资增长明显。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投资同比增长12.1%,中原城市群投资同比增长12.7%,关中城市群投资同比增长13.1%,海峡两岸城市群投资同比增长10.9%,成渝城市群投资同比增长12.1%<sup>④</sup>。

## (三) 城市化推动产业升级

在社会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发展的聚集效应直接且极大地带动了城市化<sup>⑤</sup>,而当工业化接近或进入中期时,密集的人口、集中的企业以及相对旺盛的消费能力会诱导并扩大生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需求,与需求相对应的,人口集聚导致的社会分工细化会引致服务投入的多样性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sup>⑥</sup>。世界各国发展规律表明,一国城市化进程与其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人,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与第二产业的差距缩小到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口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达到2.72亿人。随着城市化开始发力,到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达50.24%,超过第二产业9.3个百分点。事实上,服务业份额的不断提高并不会导致第二产业绝对规模的下降,2012—2015年,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是4.86%,到2014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仅次于第三产业的吸纳就业渠道。

## (四) 城市化推动创业和创新

经济在城市集聚,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合理选择需要投入的要素和劳动力;而企业的集聚也带来了劳动力就业的便利<sup>⑦</sup>。从1998年起,年度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占全部新增就业的比重就超过了100%。从2002年起,新增城镇就业人口就一直保持在全年1000万人以上,到2015年,城镇就业人口达到4万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2%<sup>⑧</sup>。而且,经济在空间的集聚能够便利知识、多种技能以及信息的有效散播,营造学习气氛,提高劳动力的专业技能,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产业之间的学习互动<sup>⑨</sup>,城市越来越成为高技能人才、高科技产业和创新产业集聚的场所。这种由于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地匹配(matching)和学习(learning)<sup>⑩</sup>,为创业和创新提供了平台。数据显示,2014—2015两年间新增市场主体达到4400万户,新增企业的年均增长达到30%以上<sup>⑪</sup>。2011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正相关性,地区分布也存在这个特点<sup>⑫</sup>。

①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差额为12169元,按照估算,到2020年,农村转移人口(尚未成为城镇居民)达到4亿,增加的消费规模超过4万亿。

②数据来源《2015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③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24\\_1516109.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7/t20170724_1516109.html)。

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年度数据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⑤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数据解读,“创业创新蓬勃兴起 新兴产业茁壮成长—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之四”。[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26\\_1506952.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706/t20170626_1506952.html)。

⑥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研发投入也相对较高。根据2011年以来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数据,除个别省份外,城市化率超过全国水平并位于前列的地区,R&D经费投入强度大都达到或超过全国水平。

## 五、结论

2001年的“十五”计划以及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确立了城市化的国家战略地位,这种政策宣誓标志着中国在城市化建设方面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城市由于集聚而产生的“便利”以及规模效应,使得城市化成为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并有效解决矛盾、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特殊时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中国城市化走过的道路。

本文对中国城市化的解读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得到的主要结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国城市化过程。在40年不到的时间里,城市化率从显著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超过世界水平,近一半人口实现了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城市规模空前增长,地区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但差距逐步缩小。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劳动力转移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分析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发现,由于非农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要大于农业部门,所以,在总劳动力不变并且非农部门有能力、有条件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农村转向城市)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转型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化通过劳动力要素的转移和集聚来释放消费潜力、拉动有效投资、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创业,从而产生系统合力、推动经济增长。

### 参考文献:

- [1]姚士谋,陆大道,王聪,等.中国城镇化需要综合性的科学思维——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方式[J].地理研究,2011(11):1947-1955.
- [2]姚士谋,张艳会,陆大道,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对李克强总理新思路的解读[J].城市观察,2013(5):5-13.
- [3]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8):3-12.
- [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8.
-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6:71.
- [6]王红扬.对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城市规划,2000(6):7-16.
- [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60.
- [8]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33.
- [9]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44-55.
- [10]AU C C, HENDERSON J V.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73(3):549-576.
- [11]陈钊,陆铭,许政.中国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未来之路:城乡融合、空间集聚与区域协调[J].江海学刊,2009(2):75-80.
- [12]GILL I S, KHARAS H.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M]. US: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232.
- [13]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J].世界经济,2011(6):3-25.

(责任编辑:黄明晴;英文校对:王慧)

## China's practice of urbanization in a transitio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the economic growth

WU Yu

( Innovative Institute for Public Management and Public Policy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 Shanghai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44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wo-sector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labor transfer on economic growth as a resul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counties with a huge population and immature markets , it has been proved by the empirical experience in nearly past 40 years that China's urbanization is highly impacted by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gradu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s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labor transfer; labor pool

( 上接第 10 页)

## Mixed-ownership structure , CEO origin and firm innovative performance

YU Xinguo<sup>1</sup> , LI Rui<sup>1 2</sup> , REN Ting<sup>1</sup>

( 1. HSBC Business School , Peking University , Shenzhen 518055 , China;

2. Hengqin Financial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easing Company Limited , Zhuhai 519031 , China)

**Abstract:** The mixed-ownership structu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plays a vital role in firm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 financial performance , innovative performance ,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 CEO) who is the key manager of the firm , to a great extent ,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This study used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year 2009 to 2013 as the sample , and adopted negative binomial panel regression method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es. The result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 of 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ve performance and a positive impact of outside CEO on firm innovation. Furthermore , outside CEO weakens the inverted-U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Key words:** mixed ownership structure; CEO origi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state-owned listed enterpris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